

國文獻資料編叢

南開經濟研究所
民國社會
經濟期刊彙編

元青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序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 20 世紀 20—50 年代出版的中外文期刊 3 種 20 冊，以《南開經濟研究所民國社會經濟期刊彙編》題名影印出版，是一件惠及學界、推動學術發展的幸事。作為在南開經濟研究所學習和工作的後人，33 年前我第一次翻閱這些塵封的期刊，探索這些期刊當年的編纂和出版者——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學術團隊的學術貢獻，前輩們帶給我內心的感動與激發起的責任感仍記憶猶新^[1]。

一、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創立與學術團隊

“五四運動”以後，隨著意識形態領域中衝破封建束縛而出現的價值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新變化，西方的各種經濟思想在中國得到更為系統和廣泛的傳播。到了 20 年代，一些中國的經濟學者開始試圖應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調查研究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希冀在對國情作出正確判斷的基礎上，就如何迅速改變我國經濟落後的狀況提出有效的對策。南開經濟研究所以及其他一些兼作經濟問題調查和研究的民間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1926 年 6 月中旬，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博士何廉先生，搭乘從加拿大溫哥華開往上海的“加拿大皇后”號回國準備赴暨南大學任教，月薪現洋 300 元。在輪船抵達日本橫濱港時收到南開大學商學

[1] 1986 年夏，筆者協助導師劉佛丁先生修改南開經濟研究所介紹，擬充實南開經濟研究所學者團隊的學術貢獻的內容。當時全國圖書館統一使用中圖編目法檢索，所以這部分使用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目法檢索的藏書不對外開放，筆者獲得特許進入圖書館書庫查閱經濟研究所藏書，撰寫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學者集團對舊中國經濟研究的貢獻》一文，發表於《南開經濟研究所季刊》1987 年第 1 期。

院院長的來函，聘請他擔任財政學與統計學教授，月薪現洋 180 元。何廉“認為京津地區係中國文化中心，教育水準，較全國其他地方均勝一籌。權衡之下還是忍痛放棄暨南豐厚的薪水，決定去南開”^[1]。他在神戶上岸，取道朝鮮，直奔天津，到南開大學赴任。

1927 年春末，何廉教授又一次謝絕了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等機構的高薪聘請，而“堅信研究會使教學生動活潑，教學有益於研究工作的豐富多彩和不斷深入；而中國由於缺乏足夠的訓練有素的人才，當務之急還是在大學中教學與研究并舉，使年輕人在學業和工作能力上都得到最好的訓練”，想要建立一所以倫敦經濟學院為模式的中國自己的研究所，以“使大學中的教學與研究相輔相成”的想法已經在何廉教授的腦海中醞釀多時，於是向張伯苓校長提出了在南開成立一個研究機構的建議，並得到了張校長和學校董事會的支持。1927 年 7 月 1 日，南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1934 年改稱為南開經濟研究所）在南開大學秀山堂成立，學校在年度預算中撥出現洋 5 000 元，同時還得到了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 4 000 元的經費支持。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以“探討和評價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工業存在的實際問題”^[2] 為宗旨，以天津地區為主要研究對象，開展中國工業化的程度與影響的研究。

1928 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留學的方顯廷，以經濟史博士論文《英國工廠制度之勝利》取得博士學位後，作為棉花交易研究團的秘書（以解決回國資費）經歐洲游覽返回中國。途中，他在耶魯大學的同學和密友何廉向張伯苓校長推薦聘請他到南開大學任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的研究主任，兼任經濟史教授。為實現“在我離開祖國遠渡重洋

[1] 朱佑慈、楊大寧、胡隆昶、王文鈞、俞振基譯：《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第 36 頁。

[2] 朱佑慈、楊大寧、胡隆昶、王文鈞、俞振基譯：《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第 41 頁。

到國外學習 7 年歸來之後，給我一個機會通過教學和研究工作來瞭解我的國家，以便我能最後證明自己對於祖國和人民的價值”^[1] 的理想，方顯廷向時任工業部長的孔祥熙辭去了國家經濟訪問局局長的職務，選擇離開薪金與其他收入為南開三倍的上海，乘船北上，於 1929 年初到天津，主持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的研究工作。

身為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主任的何廉教授，在推進經濟學教學“中國化”、構建合理的教學課程體系和編寫教材等工作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於爭取外界的經費支持與合作，先後獲得了太平洋國際學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與協和醫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聯合成立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為日益發展的農村復興運動培養急需的人才。在何廉和方顯廷珠聯璧合的組織和指導下，一批畢業於耶魯、哈佛、伊利諾伊、加利福尼亞、密西根、哥倫比亞、紐約等大學，有志於經濟研究的年輕人聚集於此；一些本所畢業的研究生出國留學，在康奈爾、威斯康星、牛津、劍橋、倫敦等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也回到經濟研究所。這些富有才華的年輕學者在實際的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中，迅速成長為知名的經濟學家，逐步形成了以何廉、方顯廷為核心的南開經濟研究所學者團隊。

南開經濟研究所從 1935 年開始招收研究生，到 1952 年院系調整時停招，共招收 14 屆 60 餘位研究生，他們畢業後，多數在國內外著名學府、研究機關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也有一些人在我國政府的經濟部門以及聯合國的經濟組織中任職，成為經濟學界泰斗級的人物，他們的畢業生論文手稿亦大都完好地存藏在南開大學圖書館。

[1] 方顯廷著，方露茜譯：《方顯廷回憶錄：一位中國經濟學家的七十自述》，商務印書館 2006 年，第 65 頁。

二、南開經濟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工作與研究成果

這個學者團隊在 1927—1948 年的二十餘年時間裏，在人數不多（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最多時有三十餘人、少時祇十餘人）、經費短缺（除抗戰之前幾年較為充裕外）、國內政局動亂（僅建所後的第一個十年有較為安定的研究工作環境）等諸多困難條件下，兼顧教學和學術研究，主要開展了物價的調查和統計分析、編製物價指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此外還有一些政治及社會問題的相關研究。

1. 物價的調查和統計分析

南開經濟研究所成立之初，首先開展的研究項目就是天津市物價的調查和統計分析，編製物價指數。從 1928 年春開始，用了近三年的時間收集到 19 世紀 60 年代到 20 世紀 20 年代全部海關貿易冊^[1]，據此編製了《中國六十年進出口物量指數物價指數及物物交易指數（1867—1927）》，於 1931 年出版。該書很快就受到國內外著名統計學者的交口贊譽。

何廉認為，物價是經濟活動的一種綜合性的具體反映，要瞭解經濟活動，必須掌握物價的變動。因此在編製進出口物價指數的同時，南開經濟研究所還著手收集天津批發和零售物價資料，進行現實的物價調查，從 1913 年開始編製以天津為代表的華北批發物價指數。同時對天津的 132 家手藝工人生活費支出進行調查，編製了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抗戰之前南開經濟研究所編製的指數共有五種，即（1）中國進出口物價和物量指數；（2）華北批發物價指數（以天津為代表）；（3）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4）天津外匯指數；（5）上海外匯指數。何廉、吳大業、豐年華等人並就指數的編製方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抗日戰爭爆發，經濟研究所南遷後曾編製重慶批發物價指數，重

[1] 南開經濟研究所因而成為國內僅有的完整收藏全部關冊的三個單位之一。

慶市工教人員、商人地主與工人生活費指數。抗戰勝利，研究所回天津後，又曾繼續調查和編製天津物價和工人生活費指數，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調查結果分別刊登在《大公報》副刊——《經濟周刊》《南開指數年刊》和天津《進步日報》等報刊上。并以單行本出版了《華北批發物價指數》《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

南開經濟研究所編製的各種指數，與當時官方公布的指數比較，由於更客觀地反映了當時物價的實際變動，受到國內外的重視，有相當高的聲譽，“提到統計，人們總會聯想到南開大學所編製的物價指數”^[1]。該指數在近三十餘年來仍為國內外學者和經濟部門實際工作者用來作為計算研究的依據。

2. 中國工業化程度與影響的研究

何廉認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國家，正處在開始實行工業化的時期。因此，南開經濟研究所一經成立，便以天津及其周圍地區為研究對象，開展中國工業化的程度與影響問題的探討。對天津市的主要工業部門，如地毯工業、織布工業、針織工業、製鞋業、糧食加工及磨坊業等進行調查，并派員深入附近農村，如寶坻、高陽等縣調查鄉村工業的發展，除刊行了書中調查報告外，還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上，何廉與方顯廷合作寫出了《中國工業化之程度及其影響》，以及方顯廷的《中國工業化之統計的分析》《中國工業資本問題》《中國之鄉村工業》《天津地毯工業》《天津織布工業》《天津針織工業》《天津之糧食業與磨坊業》《中國之棉紡織業》《華北鄉村織布工業與商人雇主制度》等系列著作，對抗戰之前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水平作出估計，總結出它的特徵和阻礙其發展的諸種障礙，并提出今後所需採取的措施和應走的道路。

3. 中國農村財政經濟問題的研究

[1] 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468頁。

在進行中國工業化的程度與影響的研究工作的同時，南開經濟研究所還對中國農村財政經濟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如前所述，當時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學者認為，中國工業化不能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農業的落後，所以改變農業的落後面貌是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而中國的農業落後是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所致。祇有在各方面大力推行合作制度，纔能振興農村經濟。經濟研究所於1935年首批培養的研究生中即以鄉村合作、地方行政、土地問題、地方財政等研究為主，并且參加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和中國農村建設協進會的工作。他們先後在山東濟寧和貴州定番（今惠水）設立實驗縣，實際參加當時的農村經濟改造，還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農村合作調查，在《經濟研究周刊》上發表了《中國之合作運動》（方顯廷）、《中國之農業合作》（吳華寶）、《中國棉花運銷合作的組織問題》（葉謙吉）、《設計農村合作社會計制度芻議》（曹康伯）等一系列論文，出版了《中國合作事業考察報告》（梁思達、黃肇興、李文伯）等書，對當時中國農村經濟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與農村經濟建設問題相配合實行綜合治理和改造，經濟研究所還組織人員對河北、山東兩省改革的若干縣區的賦稅（以田賦為主）徵收制度及其存在的弊病進行了調查，提出了一些改革賦稅制度和地方財政的建議，進而通過對一些實驗縣縣政的全面總結，提出從整體上改革農村稅制的計劃。

此外在農村經濟方面進行的研究還有：（1）東北移民區域農業經濟調查；（2）山東移民原籍的農業經濟調查；（3）河北、山東兩省棉花產區的產銷調查；（4）河北省靜海縣典當業的調查；（5）四川省稻米產銷調查等。抗日戰爭時期研究所還曾就大後方的農業金融、戰時糧食政策和糧食運輸、川北米麥的生產成本等問題進行專題研究。

4. 戰時和戰後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南開經濟研究所 1938 年隨南開大學南遷昆明，因為所長何廉兼任國民政府農本局局長又於 1939 年遷至重慶。在此期間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開展對戰時經濟的研究，尤其是對如何抑制通貨膨脹問題提出對策。研究成果集中於商務印書館 1941 和 1945 年先後編輯出版的《中國戰時經濟研究》和《中國戰時物價與生產》兩本論文集以及吳大業著《物價繼漲下的經濟學》中。在這些論著中圍繞在戰時物資供應維艱之情形下，利率上升是否將加重重工業成本而有礙於生產增加、利率上升後對囤積之打擊如何、利率上升物價平穩後，對於財政支出方面壓迫減輕之效力又如何以及於各種利害輕重慎加權衡之後，吾人究竟應否使利率升高，并以何法彌補其流弊等問題，搜集工資、家庭收支、批發物價、零售物價、生產數量、外匯率、黃金價格等方面變動的資料，運用當時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理論——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分析了戰時中國經濟中最突出的物價和生產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和建議。

在抗日戰爭後期，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學者們還曾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問題進行預測性的研究，寫出了《戰後中國工業化》等著作，但由於全面內戰的爆發，這些設想自然無法實現。

5. 經濟史研究

方顯廷是以經濟史教授的身份受聘南開大學的，他在耶魯大學以經濟史論文《英國工廠制度之成功》取得博士學位，經濟史一直是南開經濟研究所主要的研究領域和培養研究生專業方向之一。南開經濟研究所師生進行了中國經濟史資料搜集和專題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經濟史理論與研究的論文，出版了《英國工廠制度之成功》（方顯廷，英文本）、《宋代之荒政》（華文煜）、《鹽鐵論之背景及其內容之分析》（張純明）、《中國貨幣論考正》（袁賢能）、《同治二年蘇松二府減賦的原因及其經過》與《明末遼餉問題》（朱慶永）、《王安石的改革

政策》（王毓銓）、《成都平原之水利》（鮑覺民）、《秦漢隋唐間之田制》（谷霽光）等著作。

三、南開經濟研究所的藏書資料

南開經濟研究所成立之初即設立資料室，所長何廉在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前，用他的恩師著名統計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教授贈送的 500 美元購買了一整套始於 1860 年的《中國海關貿易報告》以及其他藏書，共約 4 000 冊；研究部主任方顯廷教授在歸國之際帶回了近 4 000 冊書籍和期刊^[1]，均捐予研究所資料室。在這些個人捐獻圖書的基礎上，經研所的相當部分經費用於購置有關中國經濟的外文圖書資料，并以向國內社會經濟領域的公私機構、銀行、政府經濟部門等索取他們辦的刊物，向駐京外國使團索要領事報告書等多種途徑獲取圖書、報刊資料。經濟研究所收藏經濟以及其他有關方面的典籍 2 萬餘卷，中外文雜志 600 餘種，用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目法分類編目。經研所藏圖書與大學圖書館所藏圖書相對獨立，在“七七事變”之前，先行轉移出學校，未受到日本人的轟炸。輾轉自津經香港、海防（越南）、昆明，遷至重慶，以支教學科研用。途經海防時，因敵人擬進攻越南，在滇越鐵路公司當局的幫助下搶運 90 箱圖書至安全地帶，127 箱中有 37 箱（含海關冊一套）陷入敵手，1945 年抗戰勝利後經東京盟總協助，纔償還予南開大學，該批圖書上均貼有被搶歸還圖書這類簽紙，以志國難書劫。在重慶期間，以及返津以後，經濟研究所儘管資金困難，但有關中外文圖書的購求事務一直未間斷，在運輸不便的情況下，將在美國買到的書籍暫時存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學校復員以後這些圖書陸續運回。至 1949 年天津解放，經濟研究

[1] 方顯廷著，方露茜譯：《方顯廷回憶錄：一位民國經濟學家的七十自述》，商務印書館 2006 年，第 51 頁。

所共有中西文圖書 28 000 餘種 64 000 餘冊。1952 年院系調整之後，這批圖書始藏於南開大學圖書館。

四、民國時期南開經濟研究所出版社會經濟期刊簡介

從 1927 年南開經濟研究所成立，到 1952 年院系調整南開經濟研究所停辦，發表了很多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共計出版專門著作 72 種，其中屬於統計方面的 8 種、工業經濟方面的 16 種、農業經濟方面的 11 種、地方財政方面的 9 種、經濟史方面的 9 種、政治與社會研究方面的 7 種、教科書與綜合研究 12 種。

南開經濟研究所還定期出版《經濟周刊》《政治經濟學報》《南開指數年刊》《南開社會經濟季刊》（英文版）等四種專業學術刊物。在這些刊物上除發表了大量第一手的社會調查統計資料外，還刊登了本所研究人員寫作的學術論文數百篇。南開經濟研究所從 1928 年開始在《大公報》開設副刊——《統計周刊》，1930 年 3 月改為《經濟研究周刊》，每周三專版刊登經濟研究所“中國化的經濟研究”的研究論文和調查報告。

《經濟周刊》是南開經濟研究所刊行的通俗經濟刊物，初名《統計周刊》，創刊於民國 1928 年 1 月，每星期一隨天津《大公報》發行，同年 12 月底因故暫停，計出滿一年 52 期。1930 年 3 月應《大公報》之請，恢復周刊，改名為《經濟研究周刊》，仍隨天津《大公報》發行，至 1931 年 2 月停刊。1933 年 1 月再度復刊，定名為《經濟周刊》，每星期三隨《大公報》津、滬版同時發行，內容為討論我國及世界經濟問題，并附書報介紹批評與國內外經濟時事評述，至 1937 年“七七事變”停刊，共出 250 期。1947 年 10 月，又與天津《大公報》洽定恢復刊行《經濟周刊》，續出 60 期。至 1948 年 12 月，因該報縮小篇幅而停刊。本刊旨在闡述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及其問題，并向一

般讀者介紹世界現代經濟大勢及學說。其主要內容分為四種：（1）討論中國及世界經濟問題的論文；（2）本所駐外調查員的調查通訊；（3）國內外重要書報的介紹及批評；（4）國內外重要經濟時事評述。

由於本刊歷年發表的論著大多是實際調查及研究的結果，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所以國內各界人士備加贊許，更有把它作為大學經濟學參考資料。《大公報》在中國知識階層中發行很廣，《經濟周刊》的出版，在中國還是首次，一時頗為轟動，它使南開名聲大振。“在我看來這個周刊是我們一系列出版物中最有影響的，它對全國都有重要的教育作用。”^[1]因此，應外界強烈建議，經研所將其彙印單行本，凡是與中國經濟問題無關的或有時間性的論文，一并剔出，其餘截至1936年底止，選94篇，彙為一集，定名為《中國經濟研究》，以方便廣大讀者檢閱。1937年，方顯廷將經濟研究所歷年在《大公報》經濟副刊上發表的經濟研究論文編輯成《中國經濟研究》上下兩冊，交由商務印書館發行。

《政治經濟學報》初名《經濟統計季刊》，創刊於1932年，當時季刊內容注重我國經濟與統計的研究，也刊載本所各處調查報告，并每期登載“中國經濟概況述要”一篇，總述當季或當年的中國經濟概況。此外每期還有“統計附錄一覽”，包括：（1）華北批發物價指數；（2）上海零售物價指數；（3）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4）北平生活費指數；（5）上海生活費指數；（6）上海重要商品市價；（7）上海中外銀行錢莊庫存；（8）天津上海對外匯率及外匯指數；（9）上海內匯市價；（10）上海銀貨輸出輸入數量等資料。

到1934年10月，由於研究所研究領域的擴展，把政治及社會問題也納入研究範圍之內，遂改名為《政治經濟學報》。期刊定位為：

[1] 朱佑慈、楊大寧、胡隆昶、王文鈞、俞振基譯：《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83頁。

經濟研究所定期刊物之一，按季度出版。學報所載，以關於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及其他有關學科之研究文字為限。學報於論著外，并注重學術新刊書籍報章之介紹與批評。前《經濟統計季刊》所載之“統計附錄”，停止在本學報發表，但於每年另出指數年刊，隨學報贈送。到 1937 年“七七事變”前已經刊至第五卷第五期。

《南開指數年刊》（*Nankai Index Numbers*）創刊於 1934 年，因為《經濟統計季刊》更名為《政治經濟學報》之後，取消了統計附錄，而將經濟研究所的各種指數編製為年刊，印成單行本而創刊。

《南開指數年刊》的內容分為引言、指數及附錄三部分。引言簡略說明將各種指數編製的方法；指數即前述批發物價、生活費、國外匯兌及國外貿易等四種指數；附錄包括國內公私團體編製發表的各種指數及國內外重要金融統計。全書圖表並重，中英文兼列，便於參考。

南開經濟研究所於 1949 年 4 月和 1950 年 2 月分別編輯發行了《南開指數專刊第一輯——華北批發物價指數》和《南開指數專刊第二輯——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 (《南開社會經濟季刊》) 原名為 *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Service* (《南開統計周報》)，創刊於 1928 年，用英文出版，登載本所編製的物價指數及其他統計材料，包括 (1) 華北批發物價指數；(2) 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3) 國內匯兌率；(4) 折息、洋厘、大條銀及標金價等項。

1929 年以後，又增入“中國經濟統計論述”一欄，專載關於中國農工商業及財政、運輸、勞工、人口等問題的統計摘要。至 1934 年，由於周刊篇幅不便於擴充，遂改為月刊，并更名為 *Monthly Bulletin on Economic China* (《中國經濟月報》)，仍用英文出版。內容除了賡續刊載各項統計外，還刊有有關我國經濟的專論，以使國外讀者瞭解我國的經濟狀況，此外還設有“中國經濟論著索引”一欄，以便於研究中

國經濟的人士參考。

1935 年起，*Monthly Bulletin on Economic China* 再度更名為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開社會經濟季刊》），改月刊為季刊，內容也大為擴展，包括：（1）關於社會科學的論著，對於與國情有關的社會科學論著尤為注重；（2）新書述評及介紹，注重中文書籍；（3）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現狀及發展；（4）社會科學文獻述評；（5）關於中國經濟問題新著的介紹。

至 1937 年“七七事變”一度停刊，後為增進國際對戰時中國經濟的認識，喚起國外同情援助，曾於 1940 年復刊，後因種種困難而停刊。

2017 年南開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簽約，擬將館藏原經濟研究所的相關刊物結集出版，不僅再現南開經濟研究所先賢學貫中西又腳踏實地所做之經濟調查、學術著述，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提供資料與調查的方法與視野，同時亦展現他們篳路藍縷初心不改的辦學施教、盡力研究中國經濟的愛國情懷，亦可於其中窺見南開大學一以貫之的公能教育宗旨，而且，從來不會因為經費不足而止步不前，反而在經費有限、環境維艱的情況下做經濟調查，給出行業認可的南開指數，并在國內高校範圍率先招收經濟類專業研究生，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經濟人才。

此次影印出版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 20 世紀 20—50 年代出版的中外文刊 3 種 20 冊。包括：中文刊《經濟統計季刊》1932—1933 年 2 卷 8 期；後改名為《政治經濟學報》1934—1937 年 3 卷 11 期。《南開指數年刊》1934—1936 年；《南開指數專刊》1949—1950 年第一、第二輯。英文刊 *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Review*（《南開統計周報》），曾易名為 *Monthly Bulletin on Economic China*（《中國經濟月報》），後改名為 *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開社會經濟季刊》）。需要說

明的是，《南開指數專刊》第二輯出版時間雖為 1950 年，但指涉的內容則屬民國時期，幸讀者識之。

在民國時期動蕩與匱乏時代的背景下，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辦的社會經濟類期刊，不僅僅具有學術的意義，同時展現了幾十年間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學者們不斷與時局和社會相對應的研究宗旨、研究方向與“知中國，服務中國”的努力。故此，我們願意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聯手，將系列期刊雜志出版，以嘉惠學林并感召後進，也將南開先輩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傳承永續。

王玉茹

2019 年 2 月於南開園